

本期聚焦

周秉德讲述伯父周恩来的家风故事

李熙临 牟燕红

1949年6月,12岁的周秉德随父亲周恩寿(周同宇)从天津前往北京。在中南海,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伯父周恩来。

此后的15年间,周秉德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同生活,是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伯父周恩来的言传身教,在思想、学习、工作及生活上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周秉德的一生。在自己所著的《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一书中,周秉德这样写道:“忆及这些旧事,作为后人的我们,总能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并在纷繁的时代中给自己一份固守和坚持!”

也是一个6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年逾八旬的周秉德,听她将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那些故事娓娓道来。

“你们现在是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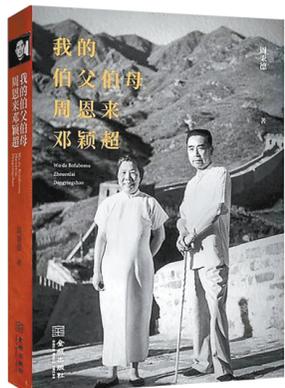
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的点点滴滴,对周秉德来说清晰如昨。

记忆中的4月,当西花厅院内的海棠花开满枝头时,周秉德少不了要陪着伯父周恩来抽空在院中散步赏花。“这是他在紧张、繁重工作间隙难得的放松机会。”在周秉德的印象中,身为共和国总理的伯父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总是匆匆忙忙出去,也是匆匆忙忙回来。”

一个暑假的清晨,周秉德早早起床,正在院子里看书。这时,忙碌了一夜的总理还没休息,也来到了院中透气。

“秉德,你怎么还在这看书?”听到伯父的厉声训斥,周秉德仰着头,百思不得其解。“你没看见那么多叔叔在那打扫卫生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在这看书啊?”

周秉德这才恍然大悟。“我这个国家政府总理的亲侄女,在这些普通战士面前,我不能高人一等。我跟他们是平等的。”周秉德至今都记得,伯父时常教育她,“我们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家人谋利的。我的责任重,但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你们以后的前途,靠你们自己。”“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秉德说。



邓颖超在颐和园养病期间,周总理也曾多次带着周秉德姐弟前往颐和园,探望他们的“七妈”(邓颖超)。然而,每次进颐和园,周总理总不忘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买票。漫步在颐和园中,周秉德眼见伯父与拥挤的人潮擦肩而过,与公园里的普通游客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在外面不能到处讲我是谁家的人,我跟他什么关系。”当记者问及“周恩来侄女”这一身份意味着什么,周秉德告诉记者,“周恩来侄女”的标签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特权。“从内心深处来讲,我们不是说去‘做’一个老百姓,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老百姓。”

“他太爱人民了,太无私了”

今年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总理62年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珍贵影像再度引发热议。网友们无不吝惜溢美之词,在评论区表达着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他太爱人民了,太无私了。他处处想的是老百姓,处处想着国家的建设,想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周秉德在回答云南网记者的提问时动情地说道:“我觉得这位总理是一个‘无我’的总理。”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破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严重人员伤亡的第一次大地震。当时,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震中地区。在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周总理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灾区群众。

在讲话时,周总理发现群众迎风而立,他便立即调转方向,自己面对风口站着。周秉德说,当时,一旁的干部见状觉得不合适,劝说总理,但总理却说:“是咱们少数人对着风合理,还是让成百上千的人对着风合理?”

回忆起伯父生前的种种细节,周秉德说:“他从来都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处处想着大家,无我、忘我。”

正因为周总理穷尽一生都甘为人民公仆,他也赢得了人民无尽的爱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百万民众自发聚集在长安街,冒着刺骨寒风,含泪相送。周恩来的名字,也成了全体中国人一份永恒的怀念。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同甘苦,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大家都非常热爱他,因为他心里总是装着老百姓。”周秉德说。

“我从来没走过一句话的路”

“两位长辈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思想上的启迪、品格上的培养,以及作风的锤炼,都付出了大量的关爱与心血。”伯父伯母多年的教育,对周秉德与弟弟妹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初中毕业后,周秉德感念于伯父伯母的日常教诲——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决定放弃高中,去上师范学校,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要建设,我觉得我应该去农村做小学老师,尽量减少文盲比重,逐步提高国民文化程度。”

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3年后,周秉德主动要求去农村工作,被分配到北京

东郊区第三中心小学当老师。但仅3个月后,周秉德便被调到朝阳区委。“伯伯说‘你怎么又到机关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没办法,他们要求是党员,我只能服从分配。”周秉德说。

因为丈夫沈人骅是军人,结婚后,周秉德也跟随丈夫离京,先去西安工作了5年,又到贵州山区里工作了4年。周秉德记得,在贵州时生活艰苦,条件简陋,大家都是共用厨房。“有一次还听到别人议论说,‘你看那家姓周,说什么周总理的侄女,要真是周总理侄女,能到这里来,跟咱们一块受这份罪吗?’”周秉德听了也不放在心上,只折回自己房间,打算等会再去。“反正都是这样,人家不相信我真的是周总理侄女。”

后来,部队要调丈夫回京,周秉德因为没有调令没有想一起走。去和部队领导告别时,面对“你周秉德回北京找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的质疑,周秉德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从来没走过一句话的路!”

在经部队领导与北京的沟通后,周秉德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又随丈夫回到了北京。而当她出现在伯父周恩来面前时,那句熟悉的话语再次响起:“秉德,你都离开北京9年了,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母在旁解释是秉德随军调动,伯父这才不再再问。“总之,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关系,在工作地点上、工作职位上、工作岗位上有任何的便利和提升。我们从来都是知道的,不能利用他的关系做任何有利个人的事情。”周秉德说。

2016年,周秉德和儿子成立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大鸾”“翔宇”分别取自周总理的乳名和字,寓意着基金会将秉承“怀慈善之心,献福祉于民众”的使命,围绕风范传承、扶贫助学、民心相通三个方面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作为周恩来的亲属、晚辈,我们将穷尽一生之努力,学习、发扬周总理的这种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我们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富裕而努力奋斗。”周秉德在书中写道。

娜嬛娜珍

“零距离”感受云南考古文化

张雪飞

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洁白的螺壳,远远看去就像积雪覆盖着大地。这些螺壳呈宝塔状,质地坚硬,捧在手里,一种久远岁月的沧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把螺壳在手心里把玩良久,刚要把螺壳往裤兜里揣,但一眼瞥见地上“螺壳也是文物,请勿带走”的提示牌,只好遗憾地摇摇头,恋恋不舍地把螺壳放回大地……

6月28日,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3年“走进古滇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远跟党走”媒体记者日活动上,来自中央驻滇及省级主要媒体的记者们,探访了晋宁古城村遗址、石寨山古墓群及河泊所遗址等地,实地体验了考古发掘现场,沉浸式参观了云南考古体验馆,“零距离”探秘那些埋藏在岁月长河里的故事,体验云南悠久的历史文脉。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司马迁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存在于滇池之畔的地方政权——古滇国。一般认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但由于史料缺乏,古滇国的历史一直众说纷纭。1956年,随着在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及黄金印,首次印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引起轰动。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一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大型聚落遗址。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便位于河泊所大遗址范围内,距遗址核心区仅百余米。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复查并明确了遗址属于青铜时代。从2014年开始,省考古所在河泊所区域开展系统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发现了从先秦时期至滇文化和西汉时期的房址、灰坑、沟、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筒牍和封泥等大量珍贵文物。

河泊所遗址近10年的考古工作构建了从青铜时代早期至汉代的完整的年代

框架和连续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勾勒出云南地区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路线。2021-2022年发现了837枚封泥和2000余枚筒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内容,为研究大一统背景下西汉时期西南边疆治理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资料。大量出土的封泥、筒牍以及高规格的建筑遗迹等遗存证明该遗址可能为益州郡郡治所在,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权的考古证据,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2年,河泊所遗址上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同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学新发现”和央视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2023年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全面启动,记者一行来到考古发掘现场时,只见在炽热的阳光下,考古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地忙碌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在上蒜一小附近进行1000平方米的发掘,力争找到与封泥和筒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并对道路进行解剖,以城市考古的视角推动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将更加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进行更广阔的多学科合作,使出土文物得到有效采集和分析。此外,将采取各种科技手段进行精细化发掘,使筒牍等文物在发掘过程中及之后得到有效保护。

而在晋宁古城村遗址,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那铺满地面的螺壳。据介绍,先民们曾打捞滇池中的螺蛳作为赖以生存的食物,日积月累,大量被食剩的螺壳便在村子周边堆积如山,成为今天破解那段神秘历史的一个密码。

古城村遗址位于晋宁区晋城镇北约5公里处的古城村,地处云南滇中滇池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北端,是云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秦时期环状贝丘遗址。遗址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保存完整的商周时期的环状聚落结构,另有土坑墓、瓮棺葬、房址、螺壳堆、水井、石墙墓等不同时期的各类遗迹近千处。建立了遗址文化堆积划分为商、两周、明清三个阶段的年代框架,



商周时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堆积。基本理清了各阶段聚落的宏观形态、功能分区、年代及文化内涵。2022年9月至今年4月,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重点对遗址商代晚期的堆积进行了细致发掘,发现了明确的商代晚期的居住类遗迹,找到了细化土坑墓年代分期的层位学证据。晋宁古城村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区发现保存完整的先秦文化环状聚落,为开展云南商周时期贝丘遗址聚落形态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为探索滇文化起源,追寻古滇文化形成和发展,并最终建立云南滇中地区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考古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

晋宁古城村遗址是云南高原保存较好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也是近年来石寨山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的重要发现,因学术价值重大,同时在文物保护及活化利用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和示范,于今年2月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据介绍,今年古城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已经全面展开,将在前两次发掘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遗址北部台地与环壕的准确形制、年代及关系,完善遗址年代序列,复原遗址原始地貌,丰富贝丘堆积形成过程的细节,解释遗址不同时期功能性质的变化及原因,讲述一个更加完整立体的古城村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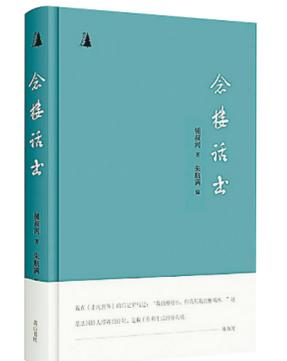
大量神秘神秘的古滇国的存在,再到大量出土弥补史书记载中的空白……随着越来越多文物和考古发现成果的问世,古滇国神秘的面纱被逐渐揭开,如何推动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促进大众对考古的科学认识,不断提升“让文物活起来”的能力和水平,成为了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在这方面,云南考古体验馆的建立是一个积极探索。

云南考古体验馆占地约2500平方米,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考古体验馆。通过考古记、里程碑、学习区、探究区、出土记、修复区等不同功能分区设置,以考古工作、古代生产生活、文保单位等沉浸式体验为核心,将场馆划分为若干个主题空间,采用现代科技与传统模式相结合的方式,配置多点触控屏、全息沉浸式投影、VR眼镜等设备,用于核心内容的展示和体验。让公众来这里学习考古知识,体验历史文化,实现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的目的。

据了解,自今年6月10日正式开馆,进入试运营阶段以来,云南考古体验馆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喜爱,目前已服务参观者300余名。7月的团队预约专场已经满额。为给予参观者良好的参观体验,保障考古体验馆现场体验的品质,计划继续以预约的方式,年内再持续开展120余场活动。

新书架

《念楼话书》出版



钟叔河著《念楼话书》(“松下文丛”之一,朱航满编)日前由黄山书社出版(2023年3月版)。这部20万字的书中,收入了作者70篇书话随笔,基本反映了作者读书、写作与编辑生涯的重要内容。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书人事”,主要谈作者与书有关的记述;第二辑“走向世界及其他”,收入作者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前言后记及有关访谈;第三辑“周作人的书”,是作者为他和朋友编的周作人著作所写的序言;第四辑“谈书一束”,收录作者编选《曾国藩家书》等以及他读书谈书的相关文字。

钟叔河,湖南人,著名编辑家、作家。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著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记》《学其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诗图笺释》等,其中“走向世界丛书”计36种、800万字,颇受学术界赞誉,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及韬奋出版奖等。

郑千山

为童声合唱插上华丽翅膀

——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

金小满

2023年7月7日至8日,一部以云南自然生态为主题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在省大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围绕这片彩云之南、万物生长、植被繁茂的土地,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艺术形式,将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之美集中展现。

纵观全剧,可谓恢宏华丽。少儿合唱团能够担纲整场舞台剧的音乐基底,可见其实力雄厚。细微处,清新自然之风扑面而来,舞美灯光、戏剧表演、文学策划都于细微处彰显出创作团队的专业水准。

这部以童声合唱为基础,进而呈现生态环保主题的舞台剧,从视觉艺术上体现出了创新和美感,合唱团成员并没有完全统一着装,合唱团成员以三种完全不同的服装、头饰,以错落有致的方式站在一起,和而不同,各有特色,且交相辉映,有错落之美。

舞蹈编创是与服饰设计相辅相成的另一大亮点,与故事情节、音乐织体、节奏变化等元素融为一体,合唱表演肢体动作,展现出专业舞蹈编创人士的精心设计。有限的合唱舞台空间,大部分只能靠上半身的肢体动作变化来烘托音乐内容。我们看到的这些合唱演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合唱演员的表演范畴,而跨入了舞蹈表演的世界。舞蹈演员用肢体语言表达和描述一切,传情达意间需要观众用思维认知去体会每一个动作的意愿,而欣赏这一群由儿童、青少年组成的合唱团的表演,有歌又有舞,就连指挥的某些动作也被设计为舞蹈动作中的一部分。《乐记》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嗷嗷也,嗷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部舞台剧在“歌”与“舞”的交织中,达到了和谐之美。以歌为主,以舞为辅,各有千秋且互相成就。

舞台剧的空间感和戏剧表现力在这部少儿合唱舞台剧中也得到了自然的舒展,这是一种将合唱艺术与舞台戏剧融为一体匠心独具。偌大的舞台,有丰富饱满的舞美效果,作为底色,稳住人心,抓住了眼球。剧中两位少年的表演在每首合唱曲之间起到了衔接的作用,既没有冲淡主题,也没有显得多余,他们的存在,让每首合唱曲之间有了内容,他们像珍珠项链的丝线,串联起所有的音乐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两位少年以及应剧情需要而陆续登台的舞蹈演员,将整个舞台连接得生动、热闹,又不显得拥挤、繁琐。

“我沿山路走来,月色多美好,羊鞭轻轻挑起,夜幕一角,抖抖满天星星,云彩脸红了……”多么浪漫的舞台剧歌

词。歌词的作者蒋明初,同时也是这部舞台剧的文学总监,作为云南本土颇具代表性且有全国影响力的词作家,歌词的文学功底和审美品味彰显出大家风范,清新脱俗且意境深邃,歌词诗情画意,颇具云南特色。这部舞台剧中体现出音乐与文学二者在艺术作品中碰撞出的火花和光彩。

说到音乐作品本身,作为一部云南本土团队打造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其音乐特色注定要在“云南”上下功夫,我们既听到了以海菜腔为蓝本进行编创的童声合唱,也听到了马背上的歌谣,还有合唱团成员敲击木板所模仿出的马蹄声、哈尼族民歌中细腻婉转的小调半音。“的的调”的童趣是山里的孩子才能体会的童年情景,“小龙舟”部分则超越了我们对于龙舟比赛的理解,孩童世界里的龙舟比赛,天真至极,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从欢快、激烈的节奏中,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龙舟比赛场面。也有同样去地域化的环保主题作品“地球妈妈”一节,旋律深情款款,书写着人间大爱,这是一首可以从云南唱到世界多地的歌,林林总总的云南音乐元素随着清幽的童声飘荡在空中,落入耳朵里,融进童心,一部用歌声描绘的《山林童话》有了云南的色彩。

舞台剧尾声,我们在合唱声中看到了舞蹈演员所扮演的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植物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这是一种用舞台艺术向云南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表达和赞美的方式。

当然,这部舞台剧的难度不小。因为这是一部少儿合唱舞台剧,我们在观赏独具匠心、精心雕琢的戏剧、服装、舞美、舞蹈等表现力的同时,也对童声合唱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部剧在音准、节奏、和声、力度以及云南众多民族歌曲的特殊音色、表现手法上都要不同于传统的童声合唱,如何在舞台剧整体效果和童声合唱特质之间找到更好的融合点,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的。

《山林童话》近年来在童声合唱领域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不同年龄段的孩童能够同台演出,90分钟的曲目,从头到尾,载歌载舞,已然是一部恢宏壮丽的大作品。舞美、灯光、戏剧情节综合于一方舞台,融进90分钟的时空里,整体清新自然,情节完整,华丽丰满,已然是一部反映云南多种艺术水平的优秀舞台剧作品。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文艺新观

读书人语

书照亮我生活的路

胡忠伟

书海茫茫,聚散是缘。有的书,读过了,弃如废书,被风吹去,不留痕迹;而有的书,哪怕只看一眼,却再也难以忘却了。

我喜欢读书。上学时,没钱买书,到处借书、找书看。20世纪80年代,姐姐哥哥们正上初中,每周末总会从学校带一些书回来,在他们写作业的当儿,我就去翻阅这些书刊,记得有登着贾平凹小说的《收获》杂志等。那时候,山村闭塞,并不知道能从哪里弄到更多的书来读。所以,姐姐哥哥们的周末,就成了我的节日——读书节。

多年以后,在报上读到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的散文《像猎狗一样去找书》,我恍然大悟,原来作为70后的同龄人,我们的经历何其相似乃尔。

参加工作后,手头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零钱,就再也不满足于借书看了,虽然有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但对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还是买来读比较过瘾。起初是通过邮局订购。只要发现了好书,自己觉得喜欢的,哪怕是托人也要替我邮购回来。印象中我邮购过鲁迅、贾平凹、沈从文等名家的书,也邮购过《名家写景100篇》等这样的书。

现在想想,20多年前在山村学校教书的那段日子,感觉还是充实的。白天,与学生一起学习,教他们知识,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晚上,在昏黄的电灯下,读自己喜欢的书。学生们放学了,离家近的老师回家了,偌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正是读书学习的好时光。有时候,读到兴头上,也会“诗兴大发”,随手涂鸦,写上几行,如此日积月累,几年里我的文章也零零星星在报刊上露了脸。

进城后,买书的书会多了,也便捷了,书籍越买越多,虽然一再告诫自己,“读归多慎买书”,但每每见了喜爱的书,还是忍不住驻足、翻阅、购买。家里的书柜也从一个扩展到两个、三个……好在,自己读书之余,喜好写文章,“出卖文章为买书”,散碎的稿费收入,抵消了买书的耗资,也就哄得老婆大人的高兴。

更多的时候,面对堆积如山的书册,有的读过,有的充其量翻过而已,自己就有点惭愧。给《水浒传》画插图的陈老莲有一句诗是“略翻书数则,便不愧三餐。”这几年,对我而言也就是多读了

几本书而已。

读书,是教人长知识的过程,也是识人知世的过程。

某年,我的乡党、著名诗人田玉川先生,从北京给我寄来他的著作《礼记与百姓生活》签名本,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本签名本。过了几天,这本书就被一位同事借走了。半年之后,我想起此书,问同事讨要,同事先是推脱忘在家了,过几日再问,他竟面面无表情地说找不见了。这回,轮到我自己尴尬了。唉,我的签名本!

有此尴尬的借书“教训”,此后买了好书,或是收到师友的赠书或签名本,便只能躲进书房里,慢慢欣赏起来。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地侍候着这些书宝贝,但丢掉的还是不少,有的书,是真弄丢了,也有的是被一些“书瘾者”隐匿了。借书给人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了,并不是真的慷慨大方,倒是看破了读书人心里的那“小九九”,自己觉得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这使我想起了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的一个主张:让书流动起来,是呀,让好书流到更需要的人那里去吧。

每每独坐书房,就常常想起那些“曾在我家”的书来,像董桥的《今朝风日好》、扬之水《采绿小辑》、谷林的《书有三叠》、孙犁的《书林秋草》等,光是书名,就那么多美好。这不,这几日又想读它了,没办法,只好去网上搜求。这些书,我曾翻阅过,给我美好的体验,它们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我生活的路。

最近看到有人晒谷林的一本文集《觉有情》,谷林的文字清浅有味,颇得知堂之风韵,我很喜欢。以前买过他的《书边杂写》《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等,“读归多慎买书”,但每每见了喜爱的书,还是忍不住驻足、翻阅、购买。家里的书柜也从一个扩展到两个、三个……好在,自己读书之余,喜好写文章,“出卖文章为买书”,散碎的稿费收入,抵消了买书的耗资,也就哄得老婆大人的高兴。

如今,那些“曾在我家”的书,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上,读着它们,我感觉着一种独特的暖意。